

蘇聯不滿份子的政治運動

熊自健

在當今蘇聯境內的不滿份子 (dissidents) 中，有一批人士打着「馬克思主義」，「新列寧主義」(Neo-Leninism) 或「新布爾什維主義」(Neo-Bolshevism)，「自由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 的旗幟；重新以馬列主義的觀點，對蘇聯現行體制，提出全面性的批判。作者稱這股勢力為左翼不滿份子。他們的活動，開始於史達林統治的後期，以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達到最高潮。他們不僅聯接十月革命的傳統，並且與沙卡洛夫 (A. Sakharov) 等民主運動鬥士共同奮鬥，成為蘇聯民主運動的另一潮流。

一、「手段與目的」的新思考

十月革命以來，蘇聯人民飽嘗在落後國家強迫實行社會主義的苦果。從列寧、史達林、赫魯曉夫到布里茲涅夫都沒有把蘇聯搞成馬克思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對十月革命滿懷理想的人士，紛紛再武裝着馬克思主義，向現代資本主義與蘇式社會主義挑戰，成爲一股新馬克思主義的潮流。它們有「布達佩斯學派」、「法蘭克福學派」、「布拉格之春」、「南斯拉夫模型」、「歐共主義」等。他們鑑於蘇聯的災難與勝利源於「野蠻主義」，故以「人文主義」的精神來克制它。於是在進行新的共產主義運動中，也就突出「手段與目的」的討論。我們來欣賞一段吉拉斯 (M. Djilas) 在「新階級」一書中所做的深刻反省：

「有史以來，還沒有過一個理想的目的是用非理想的、不人道的手段達成的，正如歷史上沒有一個自由社會是由奴隸造成的一樣。最能表現目的之實質及其偉大者莫過於用以達到目的之手段。

假如必須用目的來代替手段開脫罪惡，那麼一定是這目的在實質上有卑鄙的地方。真正抬高目的，並使一切爲目的而作的努力與犧牲有道理的，乃是手段，是手段的不斷改進以臻於完美、合乎人道，與增進自由。^①」

這是新馬克思主義者經歷列寧式革命後的覺悟。蘇聯左翼不滿份子的領袖格里郭倫科 (P. Grigorenko) 也有相同的論調。他在「獄中日記」中承認道：他過去所犯的錯誤是在重返列寧的道路。爾後他所領導的「新列寧主義」與「列寧主義」有本質上的不同。列寧主義的方法是用盡一切非法的組織、陰謀與暴動來達成革命的目的。今天蘇聯的新列寧主義者只是運用蘇聯憲法所

註① 吉拉斯著，「新階級」，臺北，龍田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初版，頁一八二—一八三。

賦予的權利，以公開合法的抗議活動來達成社會主義的民主^②。

從「人文主義」的精神再出發，重建社會主義，是新馬克思主義者與蘇聯左翼不滿份子的基本原則。他們在法治與人權的觀念上，可以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相通。因此，蘇聯左翼不滿份子與沙卡洛夫等民主鬥士，共同在蘇聯的憲法下，為蘇聯的民主與人權奮鬥。但是他們的終極目標不同，所以運用的方法也就稍有出入。

一般而言，蘇聯的民主運動所共同使用的方法為：向蘇聯最高當局寫信、公開抗議、向世界公開蘇聯壓迫人權的史實，出版地下刊物(Samizdat)……等^③。由於蘇聯左翼不滿份子強調共產黨為政治上的領導力量，馬克思主義是社會意識形態的指導，所以他們特別期望「由上而下」的改革，努力促使蘇聯共產黨能像南斯拉夫或捷克「布拉格之春」的領導階層一樣進行改革，帶動蘇聯往真正社會主義之路邁進。配合此一策略，他們運用了以下的戰術：

- (一) 出版各種回憶錄與書籍來檢證蘇聯共產黨的黨史與黨義。
- (二) 要求蘇聯共產黨與國際共產黨恢復托洛茨基、布哈林、卡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之名譽。
- (三) 向世共大會進軍。

這些戰術都是針對史達林主義而生的。他們的根本觀點是：史達林背叛十月革命的正統，只有清除史達林主義才能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出版回憶錄與書籍的用心，在於一方面緬懷十月革命的熱情與理想，一方面清算史達林如何破壞此一傳統^④。要求恢復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名譽，旨在徹底改變史達林主義，回到十月革命的正統中去^⑤。向世共大會進軍是要結束一國社會主義，恢復共產主義的國際精神^⑥。理所當然，他們對於赫魯曉夫「由上而下」的「貶史運動」(De-Stalinization)寄以厚望。但是他們很快地就發現赫魯曉夫的貶史運動，只限於批評史達林的「個人崇拜」與「恐怖統治」，不能根本改變史達林體制；於是他們紛紛探索蘇聯到「社會主義民主」之路。

註② P. Grigorenko "Diary from Prison" ed. by G. Saunders, Samizdat: Voices of the Soviet Opposition, (New York: Monad Press, 1975) p.357.

註③ 蘇聯知識份子民主運動所使用的諸方法以及蘇聯當局的應付，請參閱拙著，「沙卡洛夫與蘇聯知識份子的民主運動」，臺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問題與研究」，第十九卷第一期，頁八九—九二。

註④ 最著名的著作為A. Chumakova, *Memoirs of a Bolshevik Leninist*. Roy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都對於蘇聯共產黨的黨爭與史達林主義有深刻的記載與批評。

註⑤ 關於恢復布哈林名譽問題，請參閱拙著，「恢復布哈林名譽問題之探討」，臺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問題與研究」，第十九卷第四期，頁九六—一〇三。

註⑥ 向世共大會進軍的動作有：(1)抗議蘇聯民族問題違背馬列主義；(2)恢復共產主義的國際精神；(3)譴責史達林罪行等等。

二、到「社會主義民主」之路

一九五六年蘇共舉行廿次代表大會，會中赫魯曉夫發表「秘密演說」，批評史達林主義。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革命，遭到蘇聯血腥鎮壓；此事引起左翼不滿份子對赫魯曉夫的絕望，因而蓬勃地發展抗議運動。同年十一月莫斯科大學學生引述列寧的訓誡，責難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事件，蘇聯當局立即開除學生學籍。此事很快傳染給各大都市的大學生，紛紛起而反抗，要求共產主義青年團實行民主，保障個人言論自由。蘇聯當局在各地共開除了四千三百多名學生以平息此事。但這些被開除的學生成爲日後蘇聯地下刊物的主將，人權與民主的鬪士^②。此外，有另一批反抗的年青人，追隨「新世界」(Novy Mir)的主編特爾瓦多夫斯基(A. Tvardovsky)走「文化反對派」(Cultural Opposition)路線。此派人士一方面從赫魯曉夫的立場反對史達林的文藝政策，另一方面却對蘇聯二〇年代的文藝政策與文學作品加以肯定，並且努力恢復俄國現實主義的傳統與介紹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一九六三年文化反對派垮台，這批年青人亦轉入地下，發展地下刊物，完成地下溝通系統、孕育反官方的意識形態^③。

一九六三年一位蘇聯少將，老布爾什維克格里郭倫科，組織復活列寧主義的研討會同盟，教育年青的列寧主義者，培養革命的新一代^④。同時赫魯曉夫進一步推行貶史運動，使關在史達林監獄中的老布爾什維克，獲得釋放。他們出獄後，繼續未完成的革命，領導年青的反抗者，使得左翼不滿份子與俄國十月革命的傳統聯繫起來^⑤。

一九六五年辛雅夫斯基事件，使蘇聯的民主運動進入新的里程。蘇聯各派的民主運動人士組成聯合陣線，共同爲民主人權奮鬥。此後「人權」與「反新史達林主義」成爲政治運動的重心。他們不同於列寧組黨鬪爭的方式，不同於托派再革命活動，他們只是大聲地、公開地抗議、再抗議！

從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五年蘇聯左翼不滿份子探索到社會主義民主之路，大致上有二個思潮，恰似「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傳統的延續。

「新布爾什維主義」者主張：(一)保持計劃經濟體制，但是工廠歸工人控制與管理；集體農場轉爲合作農場，由莊員管理；(二)政治權力歸還蘇維埃代表，實施直接民主制、反官僚政治；(三)停止政治迫害；(四)自由討論馬克思主義、自由創作文藝、自由研究科學；(五)恢復列寧主義的民族政策與國際精神；(六)共產黨領導^⑥。

註② See C. Gerstenaier, *The Voices of the Silent*, tr. by S. Hecker. (New York: Hart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p. 91-100.

註③ *Ibid.*, pp. 143-150.

註④ *Ibid.*, pp. 259-266.

註⑤ See G. Saunders ed. *Samizdat: Voices of the Soviet Opposition*, pp. 51-61.

註⑥ *Ibid.*, p. 28.

「自由社會主義」者主張：(一)市場型態的社會主義經濟；(二)議會式民主社會主義；(三)重視個人自由與價值；(四)實施多黨制；(五)逐步改革²⁹。

一九六五年後，民主運動零星的火花，燃燒成燎原之勢。蘇聯左翼不滿份子在一九六八年科斯特靈 (A. Kosterin)——左翼作家、老布爾什維克——的葬禮上，完成大結合。並且以葬禮的形式作公開的抗議。這是自一九二七年越飛 (A. Joffe) 葬禮以來，首次成功的演出³⁰。

在蘇聯民主運動的聯合戰線上，各派領袖爲人權奮鬥，同時也爲蘇聯的前途辯論。在此，我們僅評介自由主義的領導人物沙洛夫與自由馬克思主義者羅易·麥德費捷夫 (Roy Medvedev) 之間的辯論。

三、蘇聯左翼與右翼不滿份子之間的辯論

羅易·麥德費捷夫爲蘇聯歷史學者，他與同胞兄長名生物學家索里斯·麥德費捷夫 (Zhores Medvedev) 以自由馬克思主義者齊名。一九六一年蘇共廿二大，赫魯曉夫在會中發表「新綱領」，並且把史達林的棺材，抬出紅場。該年羅易·麥德費捷夫加入蘇聯共產黨。一九六二—六八年他埋首寫成歷史鉅作「讓歷史審判：史達林主義的來源與影響」(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該書從馬列主義的觀點，對史達林主義作全面的批判。他稱史達林主義爲「假社會主義」、「兵營社會主義」，因爲社會主義不僅要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且要改變人際關係。但在史達林主義下，人際關係並沒有如馬克思所謂「自由」的必然境界；相反的，却是「野蠻主義」的橫行³¹。該書完成後，遭蘇聯科學院反對，未獲准出版，只好運至西方出版。因爲此事，他於一九六九年被開除黨籍。然而羅易·麥德費捷夫並不因此而中斷他對蘇聯社會的批評與建議。他在「瘋狂問題」(A Question of Madness) 一書中，描寫其兄被關入精神病院的全部過程，使該書成爲捍衛人權的名著。「政治日記」(Political Diary) 記載一九六四—七一年蘇聯民主運動的歷史。「論社會主義的民主」(On Socialist Democracy) 論述他對蘇聯未來的理想與改革的方案。

一九六四年沙卡洛夫在蘇聯科學會議上批評李森科主義 (Lysenkoism)，結識了索里斯·麥德費捷夫。從索里斯·麥德費捷夫處閱讀地下出版物，並與麥德費捷夫兄弟討論問題。羅易·麥德費捷夫與沙卡洛夫都是改革主義者，他們與杜金 (V. Turchin) 於一九七〇年寫信給蘇聯最高當局，提出改革的計劃³²。但是沙卡洛夫與羅易·麥德費捷夫的終極理想不同，逐漸分

註²⁹ Ibid. p. 29.

註³⁰ 科斯特靈葬禮的全部經過，詳參 G. Saunders ed. *Samizdat*, op. cit., pp. 281-323.

註³¹ Roy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tr. by G. Taylor (New York: Alfred A. Knoff, Inc., 2nd, 1972.), pp. 549-556

註³² 沙卡洛夫，杜金與羅易·麥德費捷夫，詳參最高當局回信，參閱 G. Saunders ed. *Samizdat*, op. cit., pp. 399-412.

道揚鑣。沙卡洛夫希望逐漸地把蘇維埃體制轉變為西方式的民主社會，羅易·麥德費捷夫則希望蘇聯走向民主的社會主義。一九七三年羅易·麥德費捷夫發表「民主化問題與和解問題」(The Problem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Detente)一文，公開地抨擊其他不滿份子(包括沙卡洛夫在內)的「挑撥」行為和「偏激」思想¹⁹，展開了蘇聯民主運動中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對蘇聯前途的大辯論。他們辯論的主要問題有：(1)如何對蘇聯當局行使壓力問題；(2)美蘇和解政策問題；(3)蘇聯未來的理想體制。

沙卡洛夫認為蘇聯與世界產生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因此西方國家可以對蘇聯施加壓力，迫使蘇聯走向民主化。如果蘇聯領導階層能夠從西方購得高度科技機器，而沒有受到西方壓力來對內部作稍許的解放，那麼，克里姆林宮恐怕永遠不會放鬆對科學家與知識份子的控制與迫害。蘇聯需要外在的力量來解放²⁰。

羅易·麥德費捷夫則不高估外在的壓力能迫使蘇聯改變，因為儘管蘇聯需要美國的貿易與信用，但是歐洲的經濟危機更需要蘇聯出面解決。同時他認為沙卡洛夫寄望西方「右派」對蘇聯行使壓力不如由「左派」對蘇聯行使壓力，因為左派對如何改變蘇聯體制比右派有興趣而且有辦法的多。最糟的是西方領袖遲早會失去對蘇聯問題及改革蘇聯內政的興趣，而專注於其本身的問題²¹。

其次關於和解政策的辯論。一九七二年美蘇和解，沙卡洛夫曾予以嚴厲的批評。他指責道：「如果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沒有給蘇聯帶來任何的民主運動，那將是非常危險的。在這場和解的遊戲中，西方已接受蘇聯開出的遊戲規則。……和解局勢不但使蘇聯通過它不能解決的難關，而且還使它聚集更多的力量。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全世界將面對着這不可控制的官僚機器，而變得更無能為力²²。」他認為真正的和解是意識形態的和解；美蘇兩國在現代化的科技基礎上逐漸修正他們的意識形態而互相匯合(Convergence)，才是真正的和解，才能給人類帶來和平，共同為第三世界的開發而努力與合作²³。

羅易·麥德費捷夫則贊成和解政策。他認為美蘇緊張局勢的緩和，將帶給蘇聯內部改革的機會。蘇聯的工業化將迫使蘇聯走向民主的途徑。複印機、人造衛星的電視傳播、國外廣播，都將使蘇聯當局無法控制消息、信仰與思想的散播。同時，工業化的經濟體系，將使經濟管理走上分權的大道。因此，他認為蘇聯有「由下而上」改革的可能²⁴。

¹⁹ See R. L. Töke's "The Dissidents' Détente Debate" ed in *The New Leader*, Vol. LVII, No. 5, 1974, pp. 12-13.

²⁰ *Ibid.*, p. 12.

²¹ *Ibid.*, p. 13.

²² *Ibid.*, p. 12.

²³ 沙卡洛夫的匯合論，請參閱 A. Sakharov, *Reflection on Progress,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tr. by New York

²⁴ *Time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8).

²⁵ See T. Deutscher, "Intellectual Opposition in the USSR" ed. in *New Left Review*, No. 96, 1976, p. 108.

最後是有關蘇聯未來體制的辯論。沙卡洛夫是滙合論者，他認為美蘇共同面對現代科技所帶來的問題，如核子大戰的威脅，能源危機、環境污染、人口爆炸、疏離等，勢必迫使美蘇修正雙方的意識形態，共同謀求解決之道，達到雙方的滙合。到滙合之路的首要條件是學術自由。只有在充分的學術自由下，才能培養人類開放的心靈與合理的態度，藉以解決人類共同的大問題，而免於羣衆的神話與獨裁政治^②。

沙卡洛夫是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的。雖然在他那本著名的備忘錄「關於人類進步，和平共處與學術自由的反省」(Reflection on Progress,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中，曾經四次提到「列寧主義」，並且以列寧主義來批評蘇聯今日的民族政策、官僚政治^③，並且認為社會主義的前途，依賴於如何增進它的魅力——如勞動神聖等，俾與資本主義互相競賽^④；但是在他以後的著作中再也沒有引述馬列主義的觀點。他曾解釋道：當他寫「反省」一書時，他帶着些微的理想主義，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如今他已修正為自由主義者^⑤。對於蘇聯的未來，他期待於滙合，在西方對蘇聯的壓力下與學術自由的空氣中滙合。

羅易·麥德費捷夫則不同。「南斯拉夫模型」與捷克「布拉格之春」都提供給他對蘇聯未來體制的靈感，走向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之路。他認為蘇聯是「工人國家」的始創者，但是由於社會的條件與歷史環境使蘇聯從列寧主義轉變為史達林主義。他並不同意托派以再革命的方式來反史達林主義，亦不贊成新布爾什維克主義公開的抗議新史達林主義，他還是希望蘇聯最高當局在國際緩和的局勢與現代科技的壓力下，從事改革。他並不認為蘇聯已走入無望的死巷；只要除去史達林主義的毒瘤，蘇聯可以轉向「南斯拉夫模型」與捷克「布拉格之春」之路^⑥。

以上是蘇聯不滿份子之間辯論的一個浪花。這些不滿份子在層層的辯論中，探索蘇聯的前途。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們在苦難的路途上，高揚着創作的靈感，給世人留下一個個對蘇聯共產體制不滿的典型。

四、蘇聯左翼不滿份子的幾個問題

蘇聯左翼不滿份子的政治運動帶給我們幾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一)蘇聯是否為一社會主義國家？(二)蘇聯有無改革的可能？(三)民

註^② A. Sakharov, op. cit. pp.25-26.

註^③ Ibid. p. 56.

註^④ Ibid. p. 65.

註^⑤ 沙卡洛夫談話，Axelbank 訪問，西德雜誌，見 *Newsweek* No. 8, 1972, p. 13.

註^⑥ See. G. Saunders ed. *Samizdat*, p. 280, and T. Deutscher, op. cit. p. 109.

主的社會主義的可行性？

這些問題從二〇年代起就不斷地被蘇聯內外的學者、革命家及社會主義者所提出。蘇聯左翼不滿份子的政治運動更加重了人們對此等問題的反省與探索。最早對此問題提出答案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大理論家考茨基(K. Kautsky)。

考茨基在「論無產階級專政」一書中指出：在經濟落後的蘇聯，共產黨雖利用有利的條件，奪取政權；却不能用專政的手段，實現「社會主義」。考茨基說：

「社會主義的生產制度，是指由社會主持的生產組織，並要求民衆全體的經濟自治。由一個官僚制或一部份人民的專政，去主持生產的國家組織，不算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前題是：廣大的民衆已習慣於組織，已有多數經濟的和政治的團體的存在，又能够在完全自由中發展。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不是兵營。」^⑳

因此，一個國家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有它的條件或前題。考茨基詳細的論證那些條件：即(一)實現社會主義的意志；(二)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三)實現社會主義的力量；(四)無產階級的成熟性。依考茨基的分析，那些條件的具備，有賴於大工業的發達與隨之而來的民主主義。沒有發達的工業，不會有民主主義；沒有民主主義，缺乏政治訓練的無產階級，不能實現社會主義^㉑。

考茨基還指出蘇聯將形成新階級，在新階級的統治下，蘇聯無改革的可能。此一預言，在吉拉斯的「新階級」一書中，有極精彩的論述。吉拉斯深刻地論述列寧職業家革命黨在取得權力後，由於(一)道德墮落，(二)獨佔生產資料的控制權，(三)獨佔意識形態的指揮權，(四)官僚化，使蘇聯成爲一個新階級的極權制度^㉒。在此制度下，權力成爲共產主義的手段與目的，以維持新階級的各種特權與國家所有制。當權力成爲共產主義唯一的目標時，就沒有改革的可能^㉓。

無論考茨基也好，吉拉斯也好，都寄望人類未來的政治社會制度爲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是不可分的。但是西方的學者對此問題有大辯論。米塞斯(L. Mises)，海耶克(Hayek)以及弗利得曼(M. Friedman)等學者都一再辯稱現代的民主政治只能存在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之中。計劃經濟必然是中央集權，毫無民主的可能^㉔。

總之，蘇聯左翼不滿份子的政治運動是值得重視的。它聯接十月革命的傳統，打出民主人權的旗號，吸引了蘇聯的工人、知識份子與工業經理。然而它成爲蘇聯未來可能的動向嗎？馬克思所謂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或考茨基所謂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真有實現的可能嗎？我們不能不表示極大的懷疑。

註⑳ 考茨基著，鄭學稼譯「論無產階級專政」，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四年再版，頁二八。

註㉑ 同⑳，頁七—十四。

註㉒ 吉拉斯著，「新階級」，第三、四、五、六章。

註㉓ 同⑳，第七章。

註㉔ 請參閱臺北、臺銀經濟學名著譯叢：米塞斯著，「人類行爲」，海耶克著「自由的憲章」，弗利得曼著「資本主義與自由」，諸著作。